

叶圣陶

“双主”教育思想发展概说

梁 杰 著

yeshengtao
shuangzhu jiaoyu sixiang
fazhan gaishuo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yeshengtao shuangzhu jiaoyu sixiang fazhan gaishuo

叶圣陶“双主”教育 思想发展概说

梁 杰 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圣陶“双主”教育思想发展概说/梁杰编著. —徐州: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04. 8
ISBN 7 - 81070 - 940 - 2

I. 叶... II. 梁... III. 叶圣陶(1894~1988)—
教育思想—概论 IV. G40 - 092. 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89150号

书 名 叶圣陶“双主”教育思想发展概说

著 者 梁 杰

责任编辑 孙建波

责任校对 张海平

出版发行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江苏省徐州市中国矿业大学内 邮编 221008)

网 址 <http://www.cumtp.com> **E-mail:** cumtpvip@cumtp.com

排 版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排版中心

印 刷 江苏徐州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7.375 **字数** 178千字

版次印次 2004年9月第1版 2004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1.60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

董菊初

2003年下半年,在给叶圣陶的母校——苏州第一中学的老教师们作“叶圣陶教育思想的基本体系及现实意义”的讲座中,我说:“叶圣陶是一个富矿,挖掘不尽;叶圣陶是一本大书,开卷有益;叶圣陶是一条大河,奔腾不息;叶圣陶不仅是我们苏州一中的,也是我们全国教师的宝贵资源。”叶圣陶的思想是植根于丰厚的民族沃土之中,又获得西方文化的滋养,从而开放出来的灿烂之花,是一份值得继承、研究与发扬的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和开发这一资源,进一步学习叶圣陶、研究叶圣陶、发展叶圣陶,以丰硕的研究成果来纪念叶圣陶先生诞辰110周年,来更好地为今天的课程改革服务。据我所知,2004年我国的叶圣陶研究者将有好几部专著问世,梁杰的《叶圣陶“双主”教育思想发展概说》就是其中的一部。

我有机会先阅读这一专著的全稿,深感他的勤奋和坚毅,在课务繁重的情况下,写出了如此颇有特色、有创意、有深度的专著,委实不易。

从文体看,它似乎并不是一般的学术著作体,更不是教材体,也不是一般的评传体,通篇将叙述、议论与评价融为一体,因而显得既有历史感,又有理论性;既轻松,又庄重。给我的感受是,研究一个人的思想,不应该仅是抽象的说理,而应该是对全

人的研究。一个人的思想，与他的实践是紧密相关的，应该是具体的、有生命力的，而不是干巴巴的。梁杰同志就是这样，从一个新的角度，对叶圣陶的教育思想作了具有创新价值的研究，十分成功。

从结构看，它不是直线的，也不是板块的，是属于“太阳系式”的结构方式。叶圣陶的论文、小说、散文、诗歌、日记、书信，都纳入了它的结构体系，成为研究的全部对象。叶圣陶的“双主”思想作为全书的论述的中心，好似“太阳”，围绕它的有九大行星，其中离太阳系近的，就紧紧围绕太阳这一中心，思路清晰，联系紧密；而离太阳系远的，就显得若接若离，若隐若现，更远的行星就显得隐隐约约，依稀可辨，但是都没有离开太阳的引力；而且有的行星本身还有卫星，如“土卫1”“土卫2”那样。所有这些就形成了叶圣陶“双主”思想立体的网络，体现了对叶圣陶全人的研究，显得丰满结实，真实可信。

从内容看，有一定的理论深度。虽然全书没有一般的甲乙丙丁的层层概括，但能够蕴涵主旨，围绕中心，叙述叶圣陶的有关思想形成的基本脉络及其背景，来龙去脉清晰可见；阐述叶圣陶文学创作与写实文字的思想内容之间的关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任何研究的深度也都是比较的结果，本书通过对叶圣陶思想本身先后的发展变化的比较，通过叶圣陶与同代人（如陶行知）的比较，通过叶圣陶与国外的思想（如杜威）等的比较，凸现了叶圣陶思想的独特性、创造性和深刻性。

这几年对叶圣陶（包括鲁迅等）有些非议，当然，我并不认为对鲁迅、叶圣陶等名人不能批评，但是，毫无根据的用歪曲的手法来否定名人，是不负责任的；如果想借以达到抬高自己的目的，那更是要不得的。尤其是对叶圣陶的书没有仔细研读，对他的思想没有认真研究，就随便批评甚至否定，那就是无知妄说。

叶圣陶是一个从小学教师成长起来的教育家。他教过小学、中学、大学，当过教育部副部长，他是集教育家、文学家、出版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文化伟人，他的思想是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1994年在纪念叶圣陶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国著名教育家（吕叔湘、张志公、叶至善、叶立群、刘国正）又一次对叶圣陶的教育思想作了极为中肯的评价：“叶圣陶先生是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在教育方面，从理论到实践更有极为卓越的贡献。他的教育思想，既继承和发扬了我国教育传统，又充分吸收了外来的积极因素，是近百年来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教育思想。学习、研究叶圣陶的教育思想，对于改进教育有现实的和恒久的意义。”

因此，我认为，时至今日，关于叶圣陶，仍有许多的课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例如，重新解读叶圣陶的语文工具论。我一直认为，叶圣陶的“语文工具论”，不是一般的“工具论”，而是“大工具论”。我们将叶圣陶的全部思想联系起来看，就不难发现这一点。从“教材无非是个例子”的教材观来看，我们应该用教材教，让教材成为锻炼听、说、读、写、思能力的例子，成为培养思想道德的例子，还成为培养人文精神的例子；从“文道统一”的教学方法观来看，教语文，听、说、读、写、思的能力培养与思想道德及人文精神的熏陶是不可分割的；从“做人做事”的教育目的观来看，教材应该是教育学生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的例子，教语文应该是学文与育人融为一体的。由此可见，叶圣陶的“语文工具论”不仅是功能论，也是性质论，还是方法论。语文不仅是交际的工具，也是培养听、说、读、写、思的能力的工具，也是培养人文精神、审美情操的工具，也是养成一切良好习惯的工具，也是使学生懂得如何“做人做事”的工具，此谓之“大工具”。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课题可以研究，如，叶圣陶思想与新课程、新理念的渊

源关系的研究,叶圣陶思想与同代学者的关系的研究,等等。总之,我们应该像梁杰同志那样,从自己的工作实际出发,创造性地选择有价值的前沿课题作深入的挖掘,让叶圣陶的思想真正成为挖掘不尽的“富矿”,开卷有益的“大书”,奔腾不息的“大河”,沾溉中华,泽惠后世。

2004年5月8日

序

陈水能

1

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教学领域的重要问题之一，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叶圣陶先生站定现代教育学的立场，提出“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的观点，可谓一语中的。“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知道的老师应当不少，但是，像梁杰老师这样，来龙去脉头头是道，前因后果在在分明的可能就不多了。所以，深入研读这一本书，就可以深入了解叶圣陶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便是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此书的出版是很有意义的。

而今，我县在教育科研方面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不过，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成绩只能说明过去，对事业的追求应该是无止境的。教育教学中还有许多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还有许多需要我们大力开拓创新的领域。有些问题，表面上看是老问题，其实是新问题，比如，教与学，讲与练，主导与主体，课内与课外，等等。这些问题过去都曾出现过，甚至还引发过大规模的讨论。但是，如果用新课标的眼光来看的话，当年的许多看法可能都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不足呢？当我们这样追问时，我们就会发现梁杰老师的工作还有着更多更大的意义。他细细梳理了叶圣陶先生语文教育思想发展的全过程，如果我们仔细看看这一过程，就会发现他的这一选择的意义之所在。叶圣陶先生在寻找我国语文教学的正确道路时进行了

两次否定,一次是否定了枯坐听讲的私塾式教学,一次是否定了热热闹闹活动的儿童中心主义,最终形成了他的“主导—主体”观。他的这一思想发展过程是独特的,对我们各位老师深入领会新课标精神会有帮助的。

我们知道,叶圣陶先生的教学观是建立在“体验”的基础上的,他希望于学生的,是意义学习,而这一点,也正是新课标的编制者们所希望的。谈到体验,不少人不由自主地就想到了“做”,于是,课堂教学中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做”,有些人就是在这种唯“做”是求中忘记了自己上课的真正目的。“读史做人明智”,了解了叶圣陶先生“主导—主体”思想发展的过程,大家对于“体验”应该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这对于大家深入理解新课标精神实质,对于我们深入贯彻新课标精神提高教学质量是大有裨益的。从这一点来说,梁杰老师这一著作的出版也是很有意义的。

梁杰老师是勤奋刻苦的,据我所知,因了他的勤奋刻苦,他成了我县仅有的几个普通话省级测试员之一,因了他的勤奋刻苦,在近三年中,他曾两次获得全市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一等奖,也是因了他的勤奋刻苦,他才在国家及省市各级论文大赛中频频获得一等奖,也还是因了他的勤奋刻苦,他才会不断有论文在各级专业报刊上发表。如今,他的勤奋刻苦又结出了硕果,梁杰老师为我们带了一个好头。我们需要教学能手,我们也需要教研能手,我们尤其需要全能的专家。

我们期待着。

2004年6月17日

目 录

第一章 少年秉性	1
一、清末风云	1
二、少年秉性	4
第二章 邂逅杜威	15
一、初执教鞭	15
二、受聘尚公	21
三、实用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24
四、就教甬直	30
五、甬直时期的理论构建	35
六、甬直生活的影响	49
七、为学生创设美好的环境	53
八、作别杜威	62
第三章 《文心》时代的教学构建	66
一、叶圣陶的中庸	66
二、创作《文心》	70
三、《文心》的内容	77
四、叶圣陶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一致性	84
五、叶圣陶“主导—主体”教学观的初步形成	90

第四章 讨论法	100
一、避难蜀中	100
二、对传统教育思想的全新认识	101
三、讨论法的历史概述	109
四、讨论法的构想(之一)	112
五、讨论法的构想(之二)	116
六、讨论法的构想(之三)	143
七、关于讲解	146
八、学习的内驱力	148
九、课内与课外	166
第五章 “导”	171
一、北上!北上!	171
二、白话文教学问题	173
三、“导”	178
四、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	190
第六章 “我呼吁”	192
第七章 对“双主”思想的全面认识	201
主要参考书目	220
后记	222

第一章 少年秉性

一、清末风云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 19 世纪末期的中国吧。

这时候,所谓的大清帝国早已没有了汉唐时代的大度与从容,甚至连康乾时期的强悍也早已没有了踪影。有的只有屈从以及随之而来的屈辱。鸦片战争失败了,割地赔款;中法战争打输了,割地赔款;马关条约签订了,割地赔款。什么时候是个头呢?不知道,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尤其是甲午海战的失败,最叫人想不通,也最叫人不顺气。小日本算是个什么东西呢?“蕞尔岛国”、“东夷小国”,这是我们泱泱大清帝国对它最习惯的称呼,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在历时近 10 个月的甲午战争中,堂堂大清帝国却惨败于向为国人小觑的日本,号称“东方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十万中国军队溃不成军,日军侵入中国本土,肆意烧杀抢劫,无奈之下,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敌乞和。

接连不断的失败迫使我们不得不反思,尤其是甲午海战的失利更是引起了国人的一片震惊,因为,北洋水师的武器装备在当时是亚洲一流的。为什么拥有一流武器装备的“天朝上国”仍然打不过这所谓的“东夷小国”呢?这次反思的结果之一是,人们再次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传统的国学。说“再次”,是因为在此之前,人们就曾对国学的弊端进行过集中的清理。

清朝的学风，陈登原先生曾经这样概括：“故士之生彼世者，不妄附于圣贤心传之道学，即入于自标谨严之考据。非牢守于章句训诂之末技，即恣驰于情韵神采之文艺。要之，皆在口耳方寸之间，为弄笔舞心之艺，此而谓学，殊可叹焉。”（陈登原《颜习斋哲学思想述》，第5页，东方出版中心1989年版）最可注意的是陈先生的感慨：“此而谓学，殊可叹焉”。是的，在我们的传统中，多的是道学，多的是考据之学，多的是辞采之学，可就是没有多少习行之学，没有多少实用之学。最早看出这一弊端的，是明末清初的颜元。他对汉唐以来，尤其是宋代程朱理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自汉唐起，教育就走上了背离孔孟圣学的道路，诸如汉儒讲章句训诂之学，晋人竞尚空谈，隋唐流为佛老，到了宋儒更是变本加厉，讲主敬主静之学，只是在文字上下功夫，为害甚大。他认为，习行“六艺”是孔学的主要特征，而读书打坐则是程朱理学的主要特征。他慨叹，文字书本教育早已成为学校的主要倾向，致使真正的学校教育衰废已久，他说：“嗟乎，学校之废久矣……迨于魏晋，学政不修，唐宋诗文是尚，其流毒至今日。国家之取士者，文字而已；贤宰师之劝课者，文字而已；父兄之提示，朋友之切磋，亦文字而已。”（颜元《存治篇·学校》）他甚至认为，诵读经史子集是导致国家灭亡的最根本原因。因而，他重实学，重习行，重经世致用。

在颜习斋之后，魏源又高举起反对传统国学的大旗。他说：“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争治诂训音声，瓜剖钗析……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魏源集》，上册第358～359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他倡言，少些空谈，多做一些实事，要从关乎民瘼的点点滴滴做起。他的“这一思想一方面是对明末清初现实主义思潮的继承和恢复，是对十八世纪以来统治中国学术的烦琐汉学的否定；另一方面，它又是近代中国先进

思想着重社会政治的现实问题的时代精神的最早的体现。”〔李泽厚《李泽厚十年集(第三卷·中)》，第44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到了“百日维新”前后，黄遵宪、梁启超更从启蒙的意义上分别提出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黄遵宪提出：要“崇白话而废文言”，改变旧文体使之“适用于今，通行于俗”，“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参见黄遵宪1887年作《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二)〕。梁启超则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的观点(《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在他们的倡导下，白话小说作品纷呈迭出，蔚为大观，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文学潮流。它们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彻底改变了传统国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使人耳目为之一新。

这次反思的结果之二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强国的思想逐渐成为进步人士的共识，乃至成为国家的主导性政策。我们都知道，自清代以来，是林则徐第一个在幕下设立翻译局，开始放眼全世界。在他这一工作的基础上，魏源完成了他的巨著《海国图志》。如果说他们的行为还带有更多的私人性质的话，那么，到了“百日维新”时期，放眼世界，“不妨以强敌为师资”(康有为《日本变政考》)的口号已经成为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1904年，在张之洞主持制定的“癸卯学制”中，他把“中体西用”思想作为指导中国教育的基本思想。“癸卯学制”明确规定：“无论何种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谙其知识，综其才艺。”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已开始有意识地甚至主动地接受西方文化的辐射，这一切也在意味着，从此，一个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伟大时代开始了，尽管对于每一位中国人来说，这一交融的过程充满了屈辱，充满了血腥。

批判旧学，师互新学，这两股洪流汇聚到一起便注定了传统

国学再也不可能一统天下，式微已是它显而易见的命运，与此同时，它也意味着现代国学（语文）必将蓬勃兴起。

时代的发展呼唤着且必然促进着、催生着新的语文教育家的诞生。叶圣陶，正是这应运而生的时代弄潮儿之一。

二、少年秉性

就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叶圣陶诞生了。

1894年10月，在甲午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叶圣陶出生在江苏苏州府城东北隅悬桥巷的一户人家。俗语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其实这句话并没有说尽苏州的特别之处。三吴之地，文风最盛。人人“以读书为业，虽里间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识文字”，而且“凡山川古迹、土地沿革，皆晓解”（明·崔溥《漂海录——中国行记》）。有清一代，科场中共遴选出状元112位，而苏州一地，就占了25位。苏州又地处宁沪杭三大城市之间，水陆交通极为发达，自古以来，它就是著名的富庶之地。在清代，苏州又是江苏省省会所在地，乃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仅如此，苏州还是较早接受西方文化渗透的地区之一。在1895年签订的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苏州被辟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日本的势力开始渗透到苏州，而在此前后，美国在苏州已设有教会学校23所，侨民在此创办了《苏州花》、《江苏旬报》、《大苏报》等报刊（参见《苏州史话》，第232～23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所以，清末的苏州是名副其实的中西文化交汇之地。

叶家不算太穷，祖父辈曾享有“叶半街”的美誉，他家当年的店铺曾经占据了苏州城的半条街道，可惜这一切都毁于1860年太平天国进攻苏州城的那一场战火。到他父亲叶钟济这一辈时经济情况已大不如前，家里已没有自己的产业，叶钟济被迫给人

家管理田租,地位不是太高。在叶圣陶的日记中,我们还多次看到房屋漏雨的记录。

望子成龙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心愿,地处苏州的人们更是如此。叶钟济晚年得子,望子成龙之心当然更为迫切。为了让孩子求得功名,叶钟济让叶圣陶3岁就开始识字、描红,到6岁发蒙时,他已能认字3000左右。他上过3个私塾,《四书》、《五经》等均已熟读成诵。1905年夏天,叶圣陶参加了清朝举行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这一切为叶圣陶打下了很好的旧学底子。1906年,叶圣陶进入新式小学堂,老师章伯寅等都来自日本弘文书院。他们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启蒙者,留日前宣传康梁变法的主张,留日期间深受“明治维新”的影响。他们倡导爱国强国,把“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作为办校的方针。因而,他们所授的课程也与叶圣陶以往所学的明显不同。1907年,叶圣陶升入苏州府公立中学堂(即草桥中学,在今苏州市第一中学所在地,苏州一中初中部至今仍名草桥中学)。叶圣陶等人是该校的第一批学生,学校对他们这届学生或者说办学非常重视。为了办好这所学校,校长特地到日本去考察了当时日本的中学教育,回国后参照日本的经验办起了这所学校。它在课程设置方面极有特色,除了经学教《四书》、《五经》之外,其他各科和现在中学所开的课程竟没有多大区别。这些课程设置,鲜明地体现出苏州特色——中西文化交融,它们在为叶圣陶打下坚实文化基础的同时,也培养了他阔大的胸襟与开放的意识,给少年的叶圣陶以深刻的影响。他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在“有意模仿华盛顿·欧文的笔趣”(叶圣陶《叶圣陶集》第9卷第291页,下简作:《叶圣陶集》之卷9,第291页)。

在叶圣陶的初中学习生活中,我们以为有几点需要引起特别注意。

第一就是“诚”的观念。“诚”是我们中国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大学》中,把它作为“明明德”的先决条件。朱熹在谈到“诚其意”时说:“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必自谦而无自欺也。”(朱熹《四书集注》,第4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话说得很玄乎,其实说白了就是,言行一致,不要自欺欺人。叶圣陶对此很重视,在其日记中曾多次见到关于这方面内容的记载。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社会治安不太好,所以草桥中学组织了一个学团,帮助维持一下社会治安,叶圣陶等36人都报名参加了,后来“闻学团须补助军力之不足,将来或有临阵之时,于是众皆惊骇,向学团总机关索还签名单,甚或有主张解散吾校学团者。今虽不解散,唯须重行签名,真愿意者签之,而竟无其人,可笑可叹更可耻也。虽然,当必有其人,不过少数耳。余亦行将签名也”(1911年9月22日日记,系阴历。《叶圣陶集》之卷19,第55页)。在这里,他明确表达了对“诚”的看法:为了大众的利益,为了社会的进步,我们应当诚实守信,坚决实践自己的诺言,哪怕这一过程充满着危险也应该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同时,他还严辞嘲讽了那些不“诚”的行为:“可笑可叹更可耻也”,这一措辞是极其严厉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在他心目中,“诚”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最基本立足点。“人而不诚,其何以为人?”这应当是叶圣陶先生那一则日记的言外之意。这一思想后来贯穿叶圣陶的一生,是他语文教育思想尤其是作文教学思想形成的内在基础。

第二就是他“革心”的主张。所谓“革心”,用叶圣陶的话说就是“改革人心”。“革心”这一名词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在叶圣陶的日记和诗文中曾反复出现。1911年11月4日,苏州光复,18日,苏州办起了进行革命宣传的《大汉报》,叶圣陶为其撰写了祝辞《大汉天声》,在这里,他首次倡言“革心”。他说:“然而